

“凡借书不得过三种;污损卷面,罚令重订;破烂遗失,罚令赔偿,后不复借……”

“丰湖书藏”管理模式 堪比现代图书馆

文/徐志达 吴定球 何志成

雍 正十一年(1733),清政府谕令各地在省会设立书院,并拨给专项资金。上谕言:“近见各省渐知崇尚实学,不事沽名钓誉之为,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屏去浮躁奔竞之习,则创建书院,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,使之朝夕讲论,整躬砺行,有所成就,远近士子观感奋发,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。”以此为肇端,各级官办书院很快被办成全国各地大小不等的学术教育中心。

惠州丰湖书院从康熙中期择址迁建,到雍正年间因文字狱牵连一度被废止,又到嘉庆初重返原址二度复建,创建丰湖书藏,到光绪末改办惠州府学堂并成为粤东辛亥革命重要据点,再到成为广东四大著名书院之一。其间,客家人不断迁入复界区落担开基,惠州乡村书院大量涌现,东江科举人才和客家文化勃焉而兴,为沉寂多年的文化教育增添了一道亮色。

壹 今丰湖书院前身为“惠阳书院”

光绪《惠州府志》载:“今丰湖书院,旧名惠阳书院,在西湖永福寺右,国朝知府吴简建。”

吴简民,福建南安人,雍正九年任惠州知府。雍正九年(1731),他在丰山永福寺拆寺的西廬建惠阳书院,此举填补了丰湖书院“失踪”所造成的空白。

永福寺地处西湖西北岸,是环境阴森的古刹,而寺旁的书院则是有阁有轩,面向西湖,风景优美,是士子们潜心读书的好地方。

惠州知府吴简民把惠阳书院建在永福寺西侧,不仅是因为该寺靠山面湖,“形胜为吾郡丛林最”,而且它与惠州的历史文化和书院讲学,有着久远的渊源。

早在明代嘉靖二十二年(1543),王阳明入门弟子、揭阳人薛侃过惠游湖,应惠州学者叶时等人之请,就在

次年,以十州人士之请,改建书院于城西湖上。又次年落成,易名丰湖书院。

邑人陈鸿猷作于同时的另一篇文章《迁建丰湖书院碑记》,对了解重建丰湖书院的缘起过程、形势规模等都作了详细的记载:“惠故有书院名惠阳,在白鹤峰重修东坡祠,藉着在墨沼中掘得东坡墨砚而发起诗歌唱和活动;在西湖重修朝云墓,亲自题写墓碑,函驰海内文士征集诗文。这两项面向全国的征诗征文活动,参与者都是当时的著名诗人、文章大家,惠州一时受到全国文化人的关注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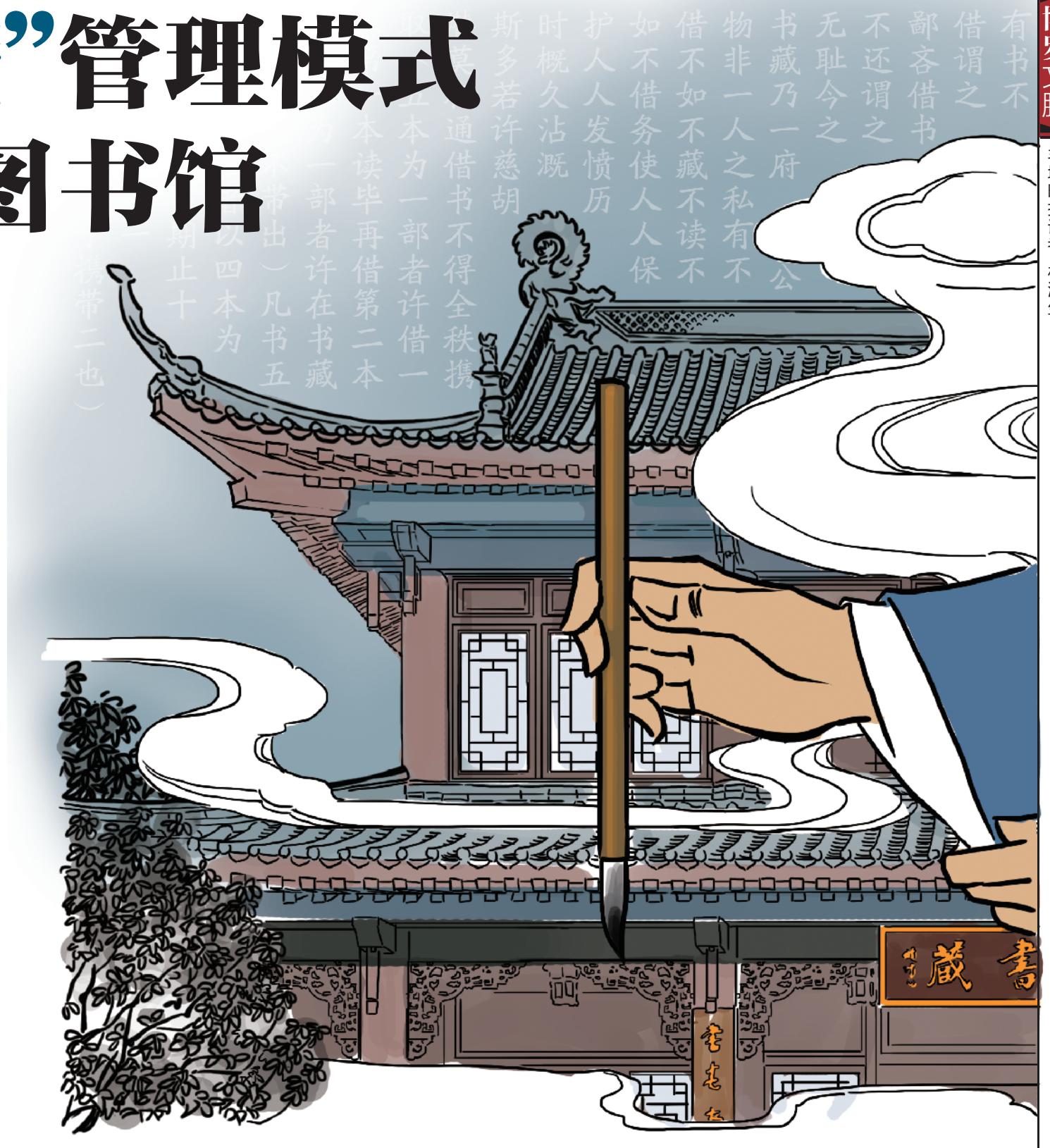
重建丰湖书院,是他在任期间的最大善政,深刻而又长久地影响了惠州的文化教育。关于重建惠州丰湖书院的缘起,伊秉绶在《丰湖书院记》中有简单记叙:“……国家尊崇正学,海隅向风。秉绶守惠之

得到更多认同,向西方学习的呼声渐渐成为社会思潮。

向西方学习,这是中国近代化之路。然而学什么、怎么学,却考验着当时的执政者。

在这场大变局中,站在大清国船头、最有能力决定大船航向的关键人物有两个:一是慈禧太后,1861年开始垂帘听政,直到1908年去世,近半个世纪里,她是大清国的主宰。

另一个是“中兴重臣”李鸿章。他在19世纪60年代剿灭太平军和捻军的战争中一步步崛起,很长时间掌握着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大权,直到1901年病逝。他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为“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



叁 丰湖书藏藏书量冠绝广东各书院

光绪十年,中法战争事发,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法议和,签订“中法简明条约”,举世哗然,以为这是不败而败,丧权辱国。少年气盛的梁鼎芬上疏弹劾李鸿章,指李有“六可杀”之罪。结果反“被迫论妄劾,交部严议,降五级调用”,成了清代绝无仅有的“从九品翰林”。

梁鼎芬于光绪十二年(1886)来到惠州,时年28岁。创建丰湖书藏,是梁鼎芬

对惠州士风影响深刻。关于丰湖书藏的建立,梁鼎芬在丰湖书院的高足李绮青曾作文追述:“……书院之西,建楼三楹,四部略备,名曰书藏。既定借书之约,复设扫除之佣。亲手题签,自装部目……盖书院之有书藏,由惠州始也。”

当时,惠州人家藏书不多,借阅尚难,谁会捐书?为此,梁鼎芬专门写了捐书启事向四方求助。这则启事后来被

完善为捐书约,是著名的《丰湖书藏四约》之一,其主要内容有:凡愿捐者,未曾购书,以书价捐人,交董事办理;凡愿捐者,无论捐书捐货,交来时记姓名,爵里,以便刻印;每书第一卷内,上盖“丰湖书藏”石印四字(凡卷内有此四字,愿嗜书者卖书者切勿购售,阴德无量)等。

梁鼎芬的这一举措,得到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大力支持。在张之洞的帮助下,梁鼎

芬很快就收到各地捐来的大批书籍,多达46000余册。

丰湖书藏除拥有“名人集部孤本不少,各省府县志搜集尤多,非各书院藏书所可及”的特点外,其藏书数量在当时广东各大书院中也是首屈一指。

在梁鼎芬及后继者的不断努力下,丰湖书藏藏书逐年增加,最多时达10万册。是广东早期较具规模的图书馆之一。

肆 已有现代图书馆管理制度雏形

为管好用好这些图书,梁鼎芬除雇请专人管理书藏外,又亲自制订丰湖书藏管理制度,亦即《丰湖书藏四约》。

《藏书约》明文规定:“每楼一层,置长木桌四张,为检书晒书之用”,“有椅可坐,便于看书”。可以说这已经是接近现代图书馆的阅览室了。

在《借书约》中他又明白地说:“有书不借,谓之鄙吝;借书不还,谓之无耻。今之书

藏乃一府公物,非一人之私有。不借不如不藏,不读不如不借。务使人人保护,人人发愤,历时概久,沾溉斯多。若许慈胡,潜莫相通。”由此可见他创立书藏的宗旨。

因为藏书来之不易,数量众多,为求人人能从中得益,他规定:“借书不得全秩携取(五本为一部者,许借一本,第一本读毕,再借第二本。若一本为一部者,许在书藏桌上翻阅,不带出)。”“凡书五本一部以上者,以四本

为限,不得多借(期止十日,易于终卷一也;卷数无多,便携带二也)。”“凡借书不得过三种(种数过多,难于查检,且贪多则不实,好博则不专,非读书有得之道)。污损卷面,罚令重订;破烂遗失,罚令赔偿,后不复借(董事、掌书生徒徇情不究者,赔偿斥退)。”“借书者,是日清晨亲到书藏携取,用洁净布巾包好,徒手者不借。”

尤为特别的是,《借书约》还明白规定:书藏之书

籍,不得借予地方长官、衙署幕友、学校教授官、监院等“公门中人”,因为“公门转折,事繁弊杂”,怕书借出后收不回来,充分显示了梁氏独特不羈的个性。

惠州丰湖书院《丰湖书藏四约》分借书约、守书约、藏书约、捐书约四部分,计五十六条,在清代藏书规章中,以其条目为最多,内容亦最为详备,很多已具备了近现代图书馆管理制度之雏形。

晚清大变局中的李鸿章:近代化探路者的突破与困境

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,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,中华民族面临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。

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,虽丧权辱国,但中外矛盾达到暂时的平衡。这时候的中国,本该痛定思痛,抓住时机奋发图强。但接着迎来的是一连串对内对外战争,太平天国运动尚未平息,第二次鸦片战争又爆发了,英法联军从中国南方一路打到北京。

面对内外交困与民族危亡,中国上下都在探求改革图存之道。西方势力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,让“老大帝国”意识到自己真的落后了,因此林则徐、魏源等“开眼看世界”的先驱思想,逐渐

得到更多认同,向西方学习的呼声渐渐成为社会思潮。

学习西方学什么?对外战争的一再失败,李鸿章等洋务派领袖都有一个富国强兵之梦,因此他们提出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,从技术层面学起。

在他的努力下,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,迅速创建起一大批军械、造船、铁路、矿务、纺织、电报等军事、民用工业,并采用“官督商办”的方式,吸引民资办实业。

毋庸讳言,洋务运动取得了很多的成功。借助于后发优势,中国短时间内在经济、科技、观念等方面获得巨大发展,迅速为传统农业国打下一定工业基础,并深刻改变了民众的生活。

1888年,中国第一支近代化舰队北洋水师正式成军,成了亚洲最强的海军力量。这是洋务运动的巅峰时期,史称“同光中兴”。无疑,李鸿章是“中兴之臣”。举国上下为洋务运动的成效沾沾自喜,认为学习西方已大获成功。

然而,正是这表面的成效掩盖了存在的问题。

洋务运动这条富国强兵之路,从一开始就有很大的局限性。他们定位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,还是放不下老大帝国的优越感,只愿学皮毛装点门面,并没触及体制等根本问题。比清政府晚两年开始学习西方的日本,是个良好的参照系。同样是学习西方,日本开展

了明治维新,从经济、军事到政治、教育等全面学习,对日本进行了较为彻底的社会改良。

于是,身为“同学”的中日两国,渐渐就拉开了差距。日本迅速完成了近代化过程,崛起为东亚强国。而大清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势头很快受到腐朽政体的制约。

惨痛的教训再次来临,日本崛起后发动了甲午战争,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,这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。从此,中国社会陷入更深的黑暗。

在中国近代史上,19世纪后半叶是个绝佳的发展时机,为何没能把握得更好些?这虽然有保守势力制约阻碍的因素,但有见识、并努力引导中

国进步的李鸿章们,却也没去争取更重要、更关键的改革,显然也有推卸不了的责任。

立足当下回望历史,中国近代化之路探索中的曲折和局限,令人唏嘘。

时代有局限,个人也有局限。晚清帝国内外交困,千疮百孔,李鸿章独掌危局,耗尽心血,也算完成了使命。但他并未把握好这个加速近代化的良机,未能通过和平改良方式完成近代化过程,终有一些遗憾。

而后随着甲午战败,中华民族跌跌撞撞进了20世纪。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,中国人民掀起了改良与革命的浪潮。继续在兵火战乱中探索复兴强国之路。

宗祠办家塾
薪火相传育后代

自古以来,惠州就是岭南学术氛围较浓厚的地区之一,修建有不少书院、私塾,尤博罗最为突出。近日,羊城晚报记者在博罗调研发现,博罗是中原客家人南下三迁后的主要聚居地之一。迁徙过程中,博罗人保持着客家最传统的韵味,秉承着“金炉不熄千秋火,玉盏常明万盏灯”的宗旨,以姓氏为伍,建立宗祠。

据《博罗县志》记载,博罗人尤重教育,在修建宗祠或祖屋时,会将拜祭先祖的祠堂和抚养后代的塾学结合,充分体现薪火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。

坐落于博罗县长宁古坭塘村的袁氏家塾,始建于清代中期,它见证了惠州地区古代家塾发展历程,同时也是惠州境内少有保存完好并有家塾牌匾的教育场所,是该村现存的一处古代文化教育场所。

该建筑坐南向北,平面呈长方形,是一座二进三开间砖木结构建筑。

人字山墙,夯土墙基,青砖墙体。

大门正上方悬挂“袁氏家塾”木牌匾,

门前左右台基、石柱、墙基均以红砂岩石为主。

据有关资料显示,博罗古坭塘孔姓后代为孔子第56代孙希尧,由南海南村迁东莞后再迁至古坭塘,现古坭塘村有孔姓700多人,村里建有孔氏祠堂等。或受此影响,该村学术风气较好,同村不同姓氏为族人传道授业而创办家塾,各自形成特色。而袁氏家塾自创办一直保存至今,非常难得。

除了袁氏家塾,博罗还有不少至今仍保持良好的宗祠用于家塾,比如石湾叶氏大宗祠中建有叶氏家塾。其门联写着:“尖峰文章秀,湾区墨池浓。”其内堂有对联“瑞日芝兰光甲弟;春风棣振家声”,充分体现了族人希望后人成才长进的心声。

杨村井水龙朱氏宗祠更在其附近专门建了一幢耕经楼,独具匠心,颇有远见。攻读经书,要像农耕一样深耕细作。堂内之联向朱氏后人深刻地揭示了这个哲理。联曰:“耕可为、商可为,百万家财无非耕商;经宜读,史宜读,一品朝官皆由经史来。”



博罗县长宁古坭塘村的袁氏家塾
林海生 摄

一脉相承的 博罗学风

博罗县位于惠州市北部,北与河源市接壤,惠州龙门接壤,东南与惠州市区接壤,西南与东莞隔江相望,西连广州增城,是京九铁路经济增长带的咽喉地带,同时也是珠三角最大的可连片开发的县区。

3000年前的博罗古国文明,在博罗这片土地上留下难以磨灭的历史印记。博罗置县始于两千多年前的秦朝,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,客家文化、南粤文化等在此相互辉映交融,使博罗积淀了深厚的人文底蕴,在今天的诸多方面仍有所体现。

记者了解到,今年广东高考录取时间从8月7日起正式开始。受疫情影响,今年高考比往年推迟了一个月,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惠州学子的正常发挥,惠州在高考成绩上依旧交出了一份较为满意的答卷,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,其中博罗的表现尤为可圈可点。

单以博罗中学为例,其上优投线人数480人,为全市第二,本科上线人数1345人,位居全市第一。取得这样的好成绩,固然与学生的共同努力密不可分,同时也和博罗县的社会环境、历史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博罗在清代时的书厂数量居惠州各县之首,且远高于全府各县平均值。当时由于博罗经济较其他县更为发达,相对优惠的经济待遇有利于博罗吸引优质师资,罗书院、登峰书院等县级书院亦有进士名儒等大家执教主讲,不仅为当时培养了许多士子文人,还给博罗留下了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,保持至今。

在全社会注重经济发展的今天,能够始终重视教育和文化,使博罗不断取得丰硕的文化教育成果,这是博罗教育风气一脉相承的最好展现。一流城市离不开一流教育,博罗在多年的发展中逐步形成积极向上的良好学风,一定会为社会提供更多人才、为城市建设贡献出更大力量!

文脉观察
羊城晚报记者 黄翔宇